

朱师辙的生平、著述及其他

丁 红

朱师辙这个名字，对于当代大部分学者来说，也许并非耳熟能详。但在民国及解放初期，他却是一位颇有名声的经史小学及诗词家，曾任清史馆协修，先后受聘中国大学、中山大学教授，“才性备具，学识广博”^①，著作丰硕，晚年定居杭州，为浙江省政协委员，倍受毛泽东、陈毅等中央领导人的关怀，是一位颇有传奇色彩的著名学者。由于各种原因，学术界对朱师辙的了解与研究迄今尚未展开，陆键东所撰《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中对朱氏生平虽略有述及，却因资料的缺乏而难以确切与全面。今年（1999年）正值朱师辙诞辰120周年，笔者从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收藏的朱氏诗词、文章、信札、专著等第一手资料入手，对其生平经历和学术成就等作了初步的研究，冀盼能为学者进行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一些线索。

一、家世与生平

朱师辙，字少滨，号充隐，别号瀛台寄主、东华旧史、西湖梦人，清光绪十四年（1879）三月二十三日出生在安徽省黟县石村。朱家“世代儒生，书香传家”^②，远祖徽国公居新安，到明朝有思亲公自新安徙河南，清咸丰年间，其先人为避战乱，选择安

徽黔县石村作为定居地，世以儒著，九传到其府君，清代著名小学家朱骏声，世称丰芑博士，就是其祖父。丰芑博士系嘉庆二十三年举人，官黔县训导，著作百余种，咸丰年间进呈《说文通训定声》一书，清廷赏国子监博士衔，名著中外。朱骏声之子名孔彰，即朱师辙的父亲，乃光绪八年举人，早年曾做过曾国藩的幕僚，历任沂南书局、蒙城书院、江楚编辑局主管，后受安徽提学使沈曾植之聘，教授安徽存古堂，民国成立后，受聘任清史馆协修，生平撰著颇多，也是一位著名学者。

朱师辙幼小丧母，体弱多病，但仍接受中国传统的正规教育，初读《毛诗》、《尔雅》，接着又读四书五经，塾师还督习试帖和八股文。这种训练虽然非他所喜好，但七八年塾馆课程的启蒙教育，给朱师辙打下了最初的国学基础。1894年，15岁的他随父入江宁，开始涉略子史。1895年入泮学，第二年考试一等，因同桌吴某的亲戚恳求，朱师辙让出禀缺而辍学。1896年其父朱孔彰应历任安徽凤阳知府、山西按察使、安徽布政使巡抚的冯煦之聘，主修《凤阳府志》并兼长淮南书院，朱师辙侍奉父亲同住淮南书院，院有藏书，这为他阅读书籍提供了方便。他开始比较认真地读史书，“自汉至五代诸史及《通鉴》”皆加检阅，“又辅以杂史、诸子文集”^③。史书杂文的无穷魅力，使他专心一意地在书海中沉潜漫游。由于熟读史书，熟悉史事，父亲要求他“咏史”。朱师辙便遵照父亲要求，开始学习写诗。大量的阅读与自身的勤奋练习，为朱师辙日后在经学、历史及诗文词方面的研究与创作奠定了扎实的根底。1902年，朱师辙以“经古第一”顺利进入苏州长洲县地方学校为庠生，1905年升入江南高等学堂，1907年毕业。当时与湖南的曾熙并为大家的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字梅庵）为两江师范学堂监督，看到朱师辙文笔优异，除给奖誉外，还函荐于安徽提学使沈曾植。沈曾植因对朱师辙也颇为赏识与优待，称其“少滨雅士”，特为他设秘书使司之职，聘其任安徽学务所秘书。机要工作并不繁重，只是一般寻常公牍事

务，沈氏意在为他创造一个良好的读书环境，使其“从容博览众籍可大成”^④。其间朱师辙还兼有安徽优级师范教员的工作，前后共五年。除担任秘书、教学工作外，朱氏此时已开始自己独立研究的生涯，《商君书解诂定本》就在此时着手撰著。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次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黎元洪为副总统兼参政院长，朱师辙任职参政院秘书，院长、秘书长印皆藏总务科铁匱，归他典掌。在袁世凯北洋政府期间，院中议决总统继任案，由袁世凯书三名候选人，藏南海金匱石室中，等袁世凯死后，再启金匱，就三人中投票选举，金匱钥匙有两把，一存总统府，一存参政院，存参政院的那把钥匙用黄绫绒封藏铁匱内，也由朱师辙掌管；由于参政院议决重要各案呈文皆由秘书长林长民亲自交朱师辙盖印，所以秘密文件多所目睹，朱师辙曾打算“他日记之，亦民国之趣史也”^⑤。在掌管秘书工作的同时，他还兼管秘书厅的图书，内有杨守敬观海堂、方略馆、资政院书馆等藏书不下百万卷，且多秘本，朱师辙皆过目并编有三馆目录。前后居南海瀛台凡四年。1915年袁世凯窃号洪宪，复辟帝制，朱师辙离开了参政院。

1912年袁世凯意欲笼络清廷遗老，设立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聘请夏孙桐、柯劭忞、王晋卿、尹石公等一批清季学者编修清史，朱师辙之父朱孔彰也被聘为协修。师辙随父身居清史馆，虽未正式从事修史工作，然“史成载笔，追随诸老，遗事研究”^⑥却是他的心愿，因此只要有空，他就尽力争取参与，其间协助父亲查找资料，并乐于承担誊录之事。1919年，朱师辙开始着手整理校勘祖父朱骏声遗稿，到1920年初，校毕《傳经室诗存四卷》。这一年其父去世，清史馆复聘朱师辙继任协修。从任清史馆协修始，到1927年《清史稿》告成，朱师辙先后撰写了《咸同列传》，整理《清史》全稿，纂修《清艺文志》^⑦，业绩可观。1921年各省皆建大学，文字学为重要课程，当时北京中国大学设有文学系，系主任是朱师辙父亲的门生胡春霖，胡氏坚邀朱师辙担任文字学教

授，因此，朱师辙在清史馆期间，还兼任北京中国大学和辅仁大学两个学校的教授。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沈兼士聘朱师辙为文献馆专门委员及博物院顾问，帮助整理清朝档案。由于朱师辙在参政院和清史馆先后工作十年，对皇史宬与瀛台情况较熟，在他的努力疏通和策划下，原归国务院的方略馆、资政院书馆、观海堂书馆和军机处档案，以及清史馆的国史馆、实录馆的数百万卷秘籍全部归属文献馆（方略馆、资政院书馆、观海堂书馆的藏书有一半早年已归松坡图书馆）。

1926年，朱师辙受河南大学之聘，离京去河南开封任教，专授《尚书》通史。1930年因病离校休养，其间因友人夏孙桐、邵瑞彭坚邀曾入聊园词社。病愈后于1932年返校继续教学。时在词学名家邵瑞彭的帮助下，将所撰词集为《黄山樵唱》付梓，但词不及百阙。1934年，他又受成都华西大学文学系主任程芝轩之聘，于1935年2月赴成都任教。其间朱师辙除教学工作外，继续校勘先祖遗稿，1935年编辑朱骏声手稿《小学识余》五卷，校毕《六十四卦解》。并撰写《音韵学丛书》，编成《释词源流汇编》。1937年夏为了调查出版《释词源流汇编》一书印刷工费事宜，他趁暑假返回北京，不料抵京旬日之后，就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抗日战争全面展开，为此他不顾家庭安危又匆匆返回成都。1939年朱师辙病重，经校方同意，自成都乘飞机至昆明转香港抵上海就医，至当年的秋天病愈。此后北京辅仁大学再三约请朱师辙返校任教，他因再次任教辅仁，教授校勘学。1943年9月，他又受聘于中国大学，主讲《尚书》研究。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成都华西大学坚邀朱师辙返校，因道路阻塞之故始终未能成行。同年12月15日，蒋介石自认抗战有功，在北京怀仁堂开茶话会，慰劳中外耆英，朱师辙奉召赴会，蒋介石走至朱氏身前，与之握手留影。1946年朱师辙受聘于安徽学院。1947年广州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力邀朱师辙南下任教，同年10月朱师辙赴

广州任教，为一级教授，教授《诗经》及研究清史，《清史述闻》成稿并刊于《岭南学报》第十一卷第一期。

解放后，朱师辙退休，在陈毅副总理关怀下，择地杭州定居，为浙江省政协委员。他遍访住杭名士学者，结交文史界耆宿，常与酆承铨、邵长光、陈锡钧、陈训慈、孙孟晋等委员会晤。时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去各地视察，并应邀出席各种学术活动和纪念活动。“文革”前，他虽然年岁已高，体弱多病，手腕颤抖厉害，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工作，《通鉴释例校正》、《北魏六镇考辨》等，皆在此时定稿。同时坚持诗词创作，就是在大动乱的1967年至1968年间，他还写有《黄山樵唱》二卷。1969年逝世，享年90岁。

二、治学成就及文学创作

在治学过程中，朱师辙最重视经部小学，认为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撰有《音韵述要》，论音韵源流、音韵反切之始、音韵叶韵之非、字音准则、诗古韵表二十二部表说等等，建立起自己的古韵学系统。他还撰有《六书例解序》、《释词源流汇编》、《魏晋南北朝社会文化史》、《商君书解诂定本》初稿、《史记补注》、《通鉴释例校正》、《通鉴问疑校正》、《通鉴补注》、《北魏六镇考辨》等著作。

朱师辙的诗，晚年结集为《黄山樵诗钞》（最初名《绮霞楼诗钞》，中岁更名为《充隐诗稿》，最后定名为《黄山樵诗钞》）；词集则有《黄山樵唱》和《续和清真词》、《清真词朱方和韵合刊》。这些作品集中既有朱氏与清史馆旧交好友的唱和，也有和毛泽东主席的长征词韵。

三、整理先人遗稿

朱骏声、朱孔彰、朱师辙祖孙三代，积年来著作百几十种，因

家贫无力梓行。在朋友的协助下，只有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等少量著作刊行于其生前。朱骏声的《尚书古注便读》于道光十三年在济南脱稿后，过了24年，才有友人梅镜蓉相助商议刊行，又因为发生太平天国战争而流产。所以朱家传世著作绝大部分都没能刊刻于世。朱师辙认为祖父“邃于经小学”，其著作是“小学之津梁，空前杰作”^⑧；又在为其父《六书例解》题序时称：“清代以著作称世，为桂馥、段玉裁、朱骏声、王筠四大家，流风所被海外亦崇许学。日本明治时有说文学会，岁奉祀典，中国自汉许叔重始，宋则二徐（徐铉、徐锴兄弟），清为桂、段、朱、王四大家，共七人皆列入祀典，可谓盛矣。而清四大家中，尤以先大父《说文通训定声》为最广，尤有裨于学者。”^⑨可惜历年来遗稿散佚颇多。在耆儒朋辈的鼓励下，朱师辙明确制定自己的学业计划，“文章学术昭清代，前辈风流应继承”^⑩。为了继述家学，他毕生倾注很多时间与精力，收集、校订、增补、编辑出版祖、父两代的遗著。1920年校毕朱骏声《传经室诗存》；1932年搜集其父残稿《临啸阁词四种》，复得拾遗二卷六十九首；1933年校毕《经诗答问》。虽然朱师辙孜孜不倦地整理先人遗稿，但仍“藏之篋衍，乏资付刊”^⑪。无奈之下，他公开向世人求助。1935年他在《临啸阁词》的题识中写道：“先大人遗著甚多，尚望海内大雅匡助刊行，不胜盼祈。”在朱师辙的努力下，到1938年已刊廿余种，然需整理未刊遗稿仍较多。随着自己年岁增长和刊书的艰辛，朱师辙感到内疚与焦急。他在《粤游杂感五绝》中写道：“自惭辜负耆儒望，难继前修学术传。”

新中国成立后，朱师辙干脆直接上书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力求实现自身无力完成的心愿，刊刻先人遗著，传播家学。1951年至1962年期间，他先后给毛泽东、董必武、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致信，并奉送祖父及本人已出版的书籍。意外的是毛泽东在收信后，竟然亲笔给朱师辙复函问候。全文如下：

少滨先生：

九月二十五日惠书并附大作各件，均已收到，感谢先生的好意。谨此奉复。顺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五一年十月七日

此信信封署寄：“广州文明路中山大学北斋十二号朱少滨教授。”朱师辙喜获毛泽东的问候信，视为晚年最大的荣幸，当即吟诗二首，以作纪念：

琅函飞下九重天，尧舜都俞在眼前。想见几铢挥翰墨，板桥风味尚依然（其一，末句称毛泽东字颇似郑板桥）。

七四孱翁兴不穷，开函肃敬对毛公。回怀元首关怀意，尊重儒宗礼更隆（其二）。^⑫

朱师辙激动又欣喜的心情，跃然于纸上。不久，在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接见赴北京开会的广东省文教厅厅长杜国庠，特别询及朱师辙情况，嘱杜国庠与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商量出版朱氏先代遗著事宜。在毛泽东主席这种特殊的关注和政府有关部门安排下，朱氏遗书得以顺利出版数种。后因出版社缩小，不少遗书没能继续出版。无奈之下朱师辙又想到，“余家三代之著作，虽有毛泽东、董必武两主席提倡出版，尚须总理赞助实行”^⑬，因此又上书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求援。

一九六二年六月陈毅副总理给朱师辙回信，全文如下：

师辙先生尊鉴：

尊函及尊著均收阅，近日才送中华书局办理出版，裁答延迟年余，十分罪过，祈先生过谅。赠诗称誉逾恒，令人惭愧。先生谓拙作使湖山生色，愚谓适得其反。先生住湖畔近十余年，而著述精勤，垂老不衰，他日秉史笔者当首书先生，可断言也。愚有志艺文，但苦于行役和外务，业余捧场而已，

言著作断不以此自欺欺人。先生《黄山樵唱》我甚喜读，词格与梦窗为近。叹咏人民事业及其伟绩，愚以此属望于先生。能常以新作见惠，不胜感谢。灾情甚重，夏日又寒暑不定，千万珍重。

陈毅 敬礼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日

在获悉陈毅既奖誉又将自己书稿交中华书局付印的复函后，朱师辙既激动又惭愧，因谱二阕以表示谢意，并希望将先代遗稿印成丛书，能嘉惠儒林。

陈毅的嘉誉和出书的希望，再次激励朱师辙勤奋著述。当时，朱师辙因年岁已高，双手患了颤抖症，不能多写字，他不惜出资请人帮助抄稿，得以继续研究整理先人遗稿。可他不曾想到的是，60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形势的剧烈动荡和变化，出版社的出版方针有了变动，再一次使他无法如愿以偿。

四、三代藏书

朱家世代皆是儒生，书香传家，历代积累收藏图书上万册，一直保存在安徽黔县石村老家。由现已归藏浙江图书馆的朱家藏书看，虽达数千册，然大部分是清季特别是清道光年间至民国初的通行本，明刻本及清初刻本虽亦间有，但较少见；宋元本则未有人藏。据统计朱家三代遗著稿本共有240种（包括批校本在内），这是一批至今仍可供学术界服务而又不可多得的宝贵的学术财富。此外朱孔彰曾为曾国藩幕僚，又历经三个书馆的主持，保存了大量官场奏稿、公函原稿、信函底簿以及社会名流学者来往信件，这部分资料也弥足珍贵。

1951年从中山大学退休后，朱师辙将藏书运到杭州亲自保管。藏书运杭州后，一直保存在朱师辙的居所——杭州岳王路30

号。

但因生活所迫藏书时有流失。朱师辙任教 40 年，最后升到一级教授，底薪 158 元余，当时亦算高薪，朱师辙退休时仍给原薪。因生活及研究所需靠原薪不够用，仍须售书物以辅助。

十年浩劫刚开始时，利用毛泽东主席的亲笔信，藏书虽然得以幸免劫难保存下来，但年迈体衰的朱师辙终于经受不了“文革”这场大洗劫的冲击折磨，而于 1969 年怀着满腹的疑问和痛苦，郁郁地与世长辞了。

注：

- ①《黄山樵诗钞》四卷，徐韞玉序。
- ②《先考仲我府君行状》不分卷朱师辙撰。
- ③《黄山樵诗钞》四卷，朱师辙序。
- ④⑤《黄山樵诗钞》四卷，卷三 1938 年“戊寅六十初度自述”
- ⑥《黄山樵诗钞》十卷，第九册“自我批评”。
- ⑦《清代艺文略》四卷，朱师辙序。
- ⑧《学易剖记》四卷朱骏声撰，朱师辙题识。
- ⑨《六书例解》朱孔彰撰，朱师辙题识。
- ⑩《黄山樵诗钞》十卷“赴粤杂咏”。
- ⑪《临啸阁词》不分卷朱骏声撰，朱师辙题识。
- ⑫诗稿散页，原件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 ⑬诗稿散页，“感恩多”，原件藏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图书馆